

亲的培养制造)是多么具有必要性。在当时才女还是尤物的时代,贵族学校如此看重奥蒂莉厄的命运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到了教育普及的时代再给奥蒂莉厄一个特例就算褻渎了。^①

正如在《亲和力》的布局结构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教育话语是可以被印证的。以此类推,有关家庭、母亲、性的话语也是可以被印证的。这本小说通过对“当时社会计划、社会意向、官员伦理和母亲水准等必然趋势的记录”与通常那些评论性的阐释实践与阐释结论形成了对照;也就是说这部文字材料作为文献文本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是别的,正是1800年左右由不同机构所代表的利益。

即使我们在文学领域内只能做极少量的纯话语分析工作,即使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作为单一的学科存在,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纯话语分析的方法理解为一种必要的章法。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洞悉事物,不会再把名著奉为圣物,把作者奉为万能的权威。《亲和力》产生的背景是教育法,这些教育法也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其他领域,它们在这些地方、这些领域组成了自己的规训法则。这些不同领域的法则相互关联、相互纠结,尽管还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公式,但可逐一从学院教育理论中寻到它们的踪迹;对这种关系予以描述将为跨学科的研究开启新的大门,尽管它已算不上一种全新的方法。

^① 见前揭书。

托马斯·恩斯特

福柯、文学与反话语

福柯与文学理论

霍斯特·埃尔芒(Jost Hermand)在1994年还宣称,西德的文学科学和文学理论“即使在1985年以后仍未对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做出积极的反应。”^①但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有所改观,^②先前已有迹象表明,福柯在文学理论教育中已得到广泛认同。例如阿希姆·盖森汉斯吕克(Achim Geisenhanslüke)在他的文章《福柯与文学》(1996)中指出,“最近几十年的文学科学正是从福柯的著作那里吸取了新的养分”^③。哈特穆特·阿本德沙因(Hartmut Abendschein)在自己的文章^④中论

^① 霍斯特·埃尔芒:《日耳曼文学的历史》,1994年,莱恩贝格版,第218页。

^② 请参看我所做的一次小型经验性考察《文学理论一隅——德勒兹对现代文学科学的影响》,载于马文·克拉达出版的《德勒兹思想入门导读》,2000年,阿沙芬堡版,第157-174页。根据这本书的介绍,福柯在1994-1998年期间所出的新文学科学理论概论中被提到的概率之多仅次于德里达、巴特,跟阿多诺并列,但排在了布尔迪厄和拉康前面。

^③ 阿希姆·盖森汉斯吕克:《福柯与文学》,1997年,奥普拉登版,第13页。

^④ 哈特穆特·阿本德沙因:《作家的由来——作家是一个发明出

述说,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研究出来的用于文学科学的话语分析方法与福柯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他文学科学家诸如克劳斯·米夏埃尔·博格达尔(Klaus-Michael Bogdal)、尤尔根·林克(Jürgen Link),^①还有一些当代文学家,包括性研究理论等都常常从福柯的理论那里寻找依据。

福柯与文学的关系存在着一个基本难点:即福柯并未研制出一套独立的文学理论。克莱门斯·卡姆勒(Clemens Kammler)曾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福柯文学科学,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要对文学话语进行分析无论如何得有一套特殊的程序方法。”^②而福柯本人从未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另外随着《知识考古学》的诞生,文学在福柯的著作中逐渐丧失了它的中心地位;福柯一开始还把文学看作是“反话语”,而后来福柯认为它在“程序化的秩序内部已不再有任何作用”。^③盖森汉斯吕克指出,每一个涉及福柯的文学理论都存在如下问题:“话语这一概念在福柯的著作中很少得到统一论证,这使得文学在他的著作中也很难有一个标来的词”,第142-151页。

① 参见于尔根·福尔曼/哈罗·弗勒出版的《话语理论与文学科学》,1988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

② 克莱门斯·卡姆勒:《历史性的话语分析》,载于克劳斯·米夏埃尔·博格达尔出版的《新文学理论阐释》,1997年,奥普拉登版,第51页。

③ 米歇尔·福柯:《文学的功能》,载于埃娃·埃德曼/赖纳·福斯特/阿克塞尔·奥内出版的《现代性的伦理学——福柯对启蒙的批判》,1990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29页。

准的定位。”^①

但我们可从福柯这方面的论述中找到两个领域,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对福柯文学原理的实践结果进行考查:首先是福柯的概念对文学科学活动或文学科学的生产性活动所起的作用,二是那些直接以福柯的观念为基础的文学理论效用或它们参照福柯的话语概念或作者概念时发生的效用。福柯的反话语和作者这两个概念引起了特别的兴趣——而我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概念的,我认为文学会赋予这两个概念一种可能性的破坏力和破坏性。

作为反话语的文学以及福柯提出的批判问题

话语被福柯定义为“属于同一组合体系的大量言论”。^②这种组合体系是所有语言言论的总和,而这些语言言论是话语实践被描述的结果,它们受制于在各话语领域里起作用的规则。这些规则反过来又“决定表现为话语语言的对象的‘组合’(整合),决定主体在话语中所处位置次序,决定话语应该采用的概念要素,决定表示它特征的理论或‘策略’安排。话语组合分析的对象是知识的生产。”^③

① 阿希姆·盖森汉斯吕克:《对理论的反击。米歇尔·福柯的文学与话语分析》,载于M.S.克勒纳的《了解米歇尔·福柯的思想》,2001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68页。

②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1973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56页。

③ 克莱门斯·卡姆勒:《历史性的话语分析》,第39页。卡姆勒在

直到1969年福柯还认为,知识尽管也体现在文学中,但不能把知识的文学性生产与知识的社会-历史性生产等同起来。在《疯癫与文明》(1961)和《事物的秩序》(1966)中,福柯把文学放在了(在现代性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与哲学话语的对立面,因为文学总是逆话语秩序规则而行,它“脱离了所有的价值,允许各式各样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空间之内。这使得它可以进行一种游戏式的反抗,例如展示那些骇人听闻的、丑恶的、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的东西。”^①福柯画出了一条“从荷尔德林到马拉梅、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文学主线,循着这条文学主线我们可以“回到自16世纪以来已被遗忘的先前那种原始的存在”。福柯把这种现代文学模式称作“反话语形式”。^②

文学由此在实证主义知识结构之外获得了自己最后的无序空间,并被神秘化。文学大胆地追问“语言在自己的存在中究竟是什么”,^③这种发问起到了“预言”式的作用。因为一旦“知识的基本结构起了变化”,一旦“这种结构变得不再稳定”,“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企求,人会像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一样被抹去”,福柯在《事物的秩序》的结尾处表达了自己的期望——让文学成为消除人的主体化的催生剂,从而把人从包围着他

① 米歇尔·福柯:《事物的秩序·人文知识考古学》,1974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65页及以下1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同上,第457页。

的、对他进行结构暴力的话语中“解放”^④出来。

然而福柯在70年代摒弃了上述理论,转而把生产知识的话语与权力概念联系起来考虑;根据这种权力概念,每一种秩序都各自形成了无法从外部进行反抗的权力体系:“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反作用力)。正因为如此,这种反抗从来不会存在于权力之外。”^⑤所有的事物都处于话语之中,福柯自此排除了文学作为反话语所拥有的自主空间。

海因里希·芬克-艾特尔对这种权力模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模式排斥了主体的地位,以至于我们想象不出反抗所处的位置,而无处不在的权力要自行毁灭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权力模式还由此排斥了‘从下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我们无法看到制造权力的人,同时,独立的反抗潜能和自主潜能也不再存在。”^⑥福柯的权力理论同时还遭到了意识形态批评家的批判,因为在这种权力模式中“意识形态概念将停滞不前”,而福柯的反抗策略“最终只会把无处不在的极权形式转换为本体论,这是古典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能力做到的事”。福柯在这些意识形态批评家的眼里成了一个“左派的海德格尔主义者”,“但福柯的‘左’仅仅是没

① 所有引文摘自上书,第462页。

② 米歇尔·福柯:《性与真理·求知之志》,1983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16页。

③ 海因里希·芬克-艾特尔:《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载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出版的《人文科学对精神的驱逐·后结构主义纲领》,1980年,帕德博恩-基尼黑-维也纳-苏黎士版,第65页。

有说出海德格尔‘右’的结果而已”。^①这些人对被福柯“弱化的真理概念”甚为反感，而在福柯看来，真理只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被权力所认可的暂时的有用性知识而已。按照福柯的观点，批判并不是关于真理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②或者说它代表着一种“道德”。^③

1968年罗兰·巴特发表了一篇题为《作者已死》的文章，它的标题很快就成了一句流行语。一年后福柯作了题为《作者是什么？》的演讲，同样表达了对现行作者概念的批判。福柯的话语模式和权力模式拒斥“原始天才”的观念，话语的参加者即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东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已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当时的话语（即包含于他所写所说之内的东西）从何而来，它们又在何种情况下让自己得以传播。福柯的话语模式同时还拒斥下列阐释学的观点：即认为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倾注了某种寓意，而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在阅读中找到原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福柯对此予以拒绝。在他那里，读者的位置反倒被加强了，因为读者要负责生产这篇文章的“意义”以及这篇文章本身；福柯认为，倘若仅仅着眼于作者本人以及他的生平经历（例如对文章

① 所有引文来自弗赖堡的自发社会主义论坛（伊萨贝尔·安布拉斯等）：《左派的海德格尔化——话语的意识形态》，见1998年2月12日的《丛林世界》第17页及以下1页。

②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1992年，柏林版，第41页。

③ 同上，第9页。

的阐释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想借此告诉我们什么呢？”）则会影响我们接近文章本身：“从作者那里找不到贯穿于整个作品的无穷无尽的意义；作者并不比作品先行一步，作者只代表一定的作用原则，这样的作用原则在我们的文化中被用来限定、排斥、挑选；简而言之，这样的原则阻碍了自由交流、自由运用、自由组合，阻碍了对假定的分解与重组。”^①

福柯还据此推翻了有关艺术作品自律性的观点，他认为艺术作品的美学形式并不是作者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而阿多诺则把艺术定义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形式”，但这种对立“并不是直接从社会中产生的”，^②它“同环境的关系如同磁铁面对一个布满铁屑的场地一样”。^③阿多诺由此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同自律的先锋艺术作品分割开来，这无异于把读者与作者割裂开来。福柯不仅不赞成这种对立，还宣称这种对立是荒唐的。福柯将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概念转换为“作者”在话语界面内的“功能”，这解决了艺术与环境相对立的矛盾。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这种观点不仅对文学理论至关重要，而它实际上已被后现代派或通俗文学的

① 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载于《关于作者理论的文集》，2000年，斯图加特版，第228页。

② 特奥多尔·阿多诺：《美学理论》，1973年，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9页。

③ 同上，第18页。

作者所接受。^①例如“通俗文学家”托马斯·迈内克(Thomas Meinecke)在1998年就详谈过自己的写作,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作者”仅仅发挥着他在社会话语内部的“作用”而已:“我并没有高居于这些写作素材之上,它们只不过通过我说话罢了。我只是整个机械装置内的小齿轮。我能对一段距离内的思想进行复写,这些思想由许多陌生的东西组成,它们并未展示写作者自己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能够让一切东西通过我讲出来,让整个的话语通过我絮叨。我只是从美学形式上对它们加以锤炼而已。”^②

但这种美学纲领蕴含着危险:在“絮叨”与“美学锤炼”之间,情况完全有利于“絮叨”。本亚明·冯·施图克拉特·巴尔(Benjamin von Stuckrad-Barre)和亚历克萨·亨宁·冯·朗格(Alexa Henning von Lange)的新通俗文学文本(它们的发行量非常成功)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制造的文学充斥着对闲谈、俚语和语言垃圾的

^① 参看托马斯·恩斯特的《通俗文学》,2001年,汉堡版。主要参看第26-29页《法国后现代》这一章节。文学科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曾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作为以下观点的例证:早在巴特和福柯的文章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人通过文学形式假定了作者的死亡或消失。

^② 摘自约亨·邦茨的《迈内克所讲述的音乐》,1998年,奥斯纳布吕克-美国版。另外,福柯还有一段建议:“我建议玩一场游戏:即让我们来一个‘不著名的年份’。在一年之内,所有的作者只能以匿名的形式发表他们的作品,而批评家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评判。”(《戴着面具的哲学家》,载于卡尔海因茨·巴克出版的《论文。今天的思考或是另一种美学前景》,1998年,莱比锡第6版,第6页)

摹仿,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在为该书的卖点服务:“一切都只是形式游戏、装潢和设计,文中找不到可以让人表明态度,进行批判的地方,因此所有的文字就自然而然地退化成了姿态、点缀。按照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的观点,究其原因是因为后现代一方面成了‘向批判告别’的舞台,另一方面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产物——它把任何领域的任何表达都变成了一种广告词。”^①在书市中彰显出的畅销书趋向、文学批判的现行范例^②、因特网上的论坛,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让人得出如下结论:差不多整整一代的年轻读者已想象不出,一个文学文本除了对现存的东西进行那种让读者易于辨认的摹仿以外还能做什么。如此下去艺术将被剥夺它最后的机会——即努力发挥自己以游戏形式进行的颠覆作用。^③

^① 弗洛里安·诺伊纳:《作为批判的文学。后现代范域中的前景》,载于《欲望》,1999年,第37+38期,第87-93页,此为第90页。加小引号的引文出自罗伯特·库尔茨的《作为意志和意向的世界。后现代,时髦左派以及危机的美学化》,1999年,柏林版。

^② 参看《口头英雄和国王的孩子们。关于德语现代文学的讨论》,由安德烈亚克·勒和赖纳·莫里茨编辑(1998年,莱比锡版),并请关注2000年在图青举行的青年作者大会上的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在克里斯托夫·西梅斯、马克西姆·比勒和马蒂亚斯·阿尔滕堡几个人载于2000年4月6、13、20日《时代》上的小品文中都有所反映。

^③ 文学领域的这种观察与音乐领域发生的现象具有相似性,这正如马克·特克西迪斯和汤姆·霍勒特在为自己出版的《少数派主流——监督社会的趋势》所写的序言(1996年,柏林-阿姆斯特丹版,第5-19页)中对通俗与流行的概念以及对规训社会(福柯)过渡到监督社会(德勒兹)所发表的看法:“以前的工厂只是一个身体,一切都作用于身

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文学课堂上。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学教育把教学方案的重点放在了作品本身的情节和对作品的生产上面，这种模式认为，为了保障对“文章的理解”，阅读过程应该是生产性的。文章的作者以及作者的整个作品和他的美学观点仅仅作为一个参考范围而存在，它们应让位于读者的生产行为，读者在与文章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把文章的各个片段进行重组，或者通过读者自己创造的文字、画面或雕塑来发展这篇文章。这种教学模式的拥护者认为，他们的纲领是针对 60、70 年代那种以分析为手段、以学习为目标、以文章的思想为批判对象的文学教育而施行的新方案，他们希望学生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找到新的阅读乐趣；文章的“本来作者”以及他们的美学构思受到蔑视或轻视，而学生在生产“一次性文章”的过程中则作为“新的作者”受到充分的重视。说到底，这种文学教学只是把文学本身作为参考资料来对待，这一现象使人联想到以下事实：福柯在他早先的文章中也仅仅把文学作为帮助他建立理论观点的一种手段，但他从未提到过文学的美学理论。

文学科学的话语分析

谁如果坚持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本身蕴含着美学的

体，而今天的企业已经成了一个“灵魂”；以前的工人还能做到拒绝把自己“从灵魂上”融入生产流程，而今天的工作人员则被期望与企业合为一体；……在规训社会，工作与休息还能被严格区分开来，而今天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像休息，而休息看上去像工作。”（第 14-15 页）

自主力量，那么他难免会在福柯的概念那里感到失望。而文学科学理论则以此另辟蹊径，对福柯的原理作了跨学科的补充和应用，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文章分析与历史的话语环境结合起来，充分考虑文学文本、文学主题和文学概念产生的条件，认识现有知识范畴和历史事实的相对性。

正因为如此，90 年代起，德国一些大学才在“文学科学”这门专业中建立起了“性别研究”这个独立的研究科目。在这方面，朱迪思·巴特勒的《对性别的不悦》（1991）尤其受到青睐。巴特勒为了克服当时流行的对性别差异的批判（一面是受歧视的“女人”，另一面是占统治地位的“男人”；她要铲除这种差异假说），以折中的方式运用了福柯的几个原理：①性别以及性的各种形式是话语的、人为的现实，它们完全不同于“自然”的东西。巴特勒不光认为文化上的性别是虚构，而且还认为生理上的性别也是虚构的。因此，“身体反抗行为”的战略应竭力“上演‘非自然’的东西”，从而促使“性别身份天然性的消除”。②安德烈娅·多罗特娅·比尔曼（Andrea Dorothea Bührmann）用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性别讨论是怎样“在话语事件的范围内”展开的，

① 参看朱迪思·巴特勒的《对性别的不悦》，1991 年，美国河群法兰克福版。重点参看书中《权力对禁忌的改写》这一章节（第 113-122 页）。但应该注意的是，巴特勒在《福柯、何秋兰（Herculine）和性别的不连续性策略》的章节（第 142-164 页）中已明显脱离了福柯的解释方向。

② 朱迪思·巴特勒：《对性别的不悦》，1991 年，法兰克福版，第 218 页。

“在这样的讨论中，妇女被归类化，因而被规范化了”。当女人们组成了一个女性经验小组并高喊着：“遵照你的天性，展示真实的自我”时，她们已经落入了话语的圈套。在比尔曼看来，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要“反正常化趋势，建立起女性身份多样化的伦理”。^①

福柯的话语分析还被用在了对文学史的描述方面，克劳斯·米夏埃尔·博格达尔(Klaus-Michael Bogdal)的《在平凡与乌托邦之间——反映19世纪话语的工人文学》(1991)就是一个例子。博格达尔以工人文学所产生的“话语环境”来论证他的话语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当时美学和文学方面的作品概念和作者概念并不适用于上述话语环境”。^②19世纪的工人文学不能用“看待‘伟大’著作那样的美学标准”^③来研究，而应该从社会历史现象中去找寻相关要素，诸如“一个新阶级的诞生，这个阶级特殊的时代意识，工人自我组织的相关功能，对资产阶级文学体系的挣脱，迟来的文化教育”。^④工人文学从文字上体现出来的“不是文学的记忆，而是历史的记忆。”^⑤这里话语分析将目光投向文

① 上述引文摘自安德烈娅·多罗特娅·比尔曼的《真实的性别》，第293页，载于玛格雷特·耶格尔和西格弗里德·耶格尔出版的《施工现场——德国当代的话语史文集》，1996年，杜伊斯堡版，第278-297页。

② 克劳斯·米夏埃尔·博格达尔的《在平凡与乌托邦之间——作为19世纪话语的工人文学》，1991年，奥普拉登版。

③ 同上，第16页。

④ 同上，第14页。

⑤ 同上，第20页。

学正是要跃过美学分析，而首先从历史状况中去观察和理解当时的文学。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在《1800/1900年的记录体系》(1987)中试图把文学说成与其他媒体相匹敌的、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加工了各种信息的媒介。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文学在1900年已失去了“先锋”媒介的作用。基特勒在做文本分析时曾尝试，将文学文本放在各历史话语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因为每个作者都“处于话语的中心位置，这些话语必然出现在他的写作中”。

尤尔根·林克(Jürgen Link)和乌尔苏拉·林克-黑尔(Ursula Link-Heer)最感兴趣的是各话语的相互交织，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互动话语”。^①归属于不同话语领域的各话语片断还体现在“总体象征”中，即在不同场合、不同领域都会出现的标志，这种标志是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的，例如政治、媒体所采用的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常听到的一句谚语“船已经满了”就传递出当今德国政治局面中出现的排外倾向。^②在《文化革命》杂志的许多期刊上，在关于“标准化”产生的研究项目中，^③

① 参看尤尔根·林克和乌尔苏拉·林克-黑尔的《话语/互动话语与文学分析》，载于《文学科学和语言学杂志》，1990年，第77期，第88-99页。

② 西格弗里德·耶格尔和他在杜伊斯堡语言社会研究学院的同事们以福柯和林克的概念、原理为基础，在语言学方面发展了一套社会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

③ 参看尤尔根·林克的《对标准化的试验——正常化标准是怎样

林克和林克-黑尔都著文论述过德国的“真理”和“标准”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以及它们又是怎样在各社会领域中生根发芽的。

结束语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要想完全以福柯的文学理论为标准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无法从福柯的著作中提炼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其次,以福柯为指导的文学无法为颠覆性文学和反话语文学做铺垫,因为福柯本人已日渐远离文学具有反话语和自主性的观念,而且他最终摒弃了这种观念。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福柯的理论:在研究文学文本时把福柯的话语概念用在考察现实权力关系和历史权力关系上,在运用的过程中把它们同社会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福柯在文学科学的话语分析理论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在历史的回顾中更为广泛地考虑到时间、环境和影响等要素,即考虑到文学文本产生的关系条件。

尽管如此,读者仍不能放弃从美学和艺术方面研究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因为这是无法用福柯的话语分析来完成的:“如果读者在与文学文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过分地使用自己的支配权,那么这种支配权最终将会变成一种毫无结果的随意性。”^①为了防止这种趋

被生产出来的),1997年,奥普拉登版。

^① 参看扬尼迪斯·福蒂斯等人的《作者与阐释》,载于他们的《关于作者身份理论的文集》,2000年,斯图加特版,第24页。

向,我们在阅读文章和进行文本生产时,既要有意识地考虑到美学范畴和美学风格,又要对它们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同时)从文学中找到一种方法,以抵御“历史终结”之后世界所沿袭的自由化发展趋向,因为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的“历史终结”把全球化的野蛮定义为不可改变的、将以此持续下去的人类的不幸命运。

种族主义和话语分析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其中包括《批判话语分析序言》(1997)、《危险的遗产——极右思想的潜伏》(1999年与玛格雷特·耶格尔合作出版)。

《我们的空间日渐狭窄》的作者丹尼尔·卢瓦克(Daniel Loick)，目前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是校园里学生会和青年民主派的积极分子和文化负责人。曾发表过文章《关于希列斯·德尔库塞的主体概念》、《从启蒙-人文主义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

《作家的由来》的作者哈特穆特·阿本德沙因(Hartmut Abendschein)，生于1969年，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台的文献资料员；曾在康斯坦茨、格拉斯哥学习过英国语言文学、美国语言文学以及日耳曼语言文学。

《福柯、文学与反话语》的作者托马斯·恩斯特(Thomas Ernst)，生于1974年，自由作家。曾学习过哲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发表过有关现代文学、现代文化和20世纪的哲学的作品，例如《通俗文学》(2001年，汉堡版)；另外还发表过评论性文章、短篇散文和讽刺文章，例如《来自巴比伦的报道，柏林点滴实录》(2000年，明斯特版)、《荒芜地带2》(1999年，莱比锡版)。

《法国哲学背景中的福柯》的作者伯恩哈德·陶雷克(Bernhard H. F. Taureck)，在布伦瑞克技术大学

教授哲学。最新著作有：《尼采与法西斯》(2000年，莱比锡版)、《米歇尔·福柯》(是著名的Rowohlt出版社于2001年出的专题论著)、《论马基雅弗利》(2002年，莱比锡版)。

《你能忆起我们受到监禁之前的时光吗？——从本雅明看福柯》的作者托马斯·布兰德泰特(Thomas Brandstetter)，生于1975年，学习过哲学，现居住在维也纳。研究领域：现代早期哲学、文化科学理论与历史编纂学、科学历史。